

■ 文化传媒研究

论终南文化之三大基本特征

刘卓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5)

摘要: 终南文化是陕西颇有特色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性文化,其特征为:文化形态上的山水之美、文化追求上的超逸之姿、文化指向上的仕宦之心。

关键词: 终南文化;山水之美;超逸之姿;仕宦之心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3-0005-05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3.002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ongnan Mountain

LIU Zhuo

(Xi'an FanYi University, Xi'an 710105, China)

Abstract: As the local culture symbol, Zhongnan Culture of Zhongnan Mountain in Shaanxi has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ongnan Culture, which is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freedom and natural soul, and the goal of politics.

Key words: Zhongnan Culture;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free and natural soul; the goal of politics

终南在秦岭,陕西境内的秦岭又称终南山、南山。清代毛凤枝的《南山谷口考》中称,“秦为天下之脊,南山则秦之脊也”^[1]。作为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关中记》云,“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沂陇,绵亘千里,经万壑千谷不能断绝,盖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处,故岭南皆为江,岭北皆为河。”^{[2]69}又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2]127}作为这条雄伟山脉上位置最中心,也是最具特色的一段,终南文化在文化基因上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方面,它地兼南北,融合了终南山南北两麓的农耕与游耕经济的特点,以农耕为主,间有游耕;另一方面,它兼容了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的气质,卓而不群,气韵独具。独特的文化基因,造就了终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特征,亦反映了终南文化独特的价值观。

终南文化“是数千年来活跃在终南山地带的人们创造的以自然地理景观为表征,以政治经济为背

景,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以宗教文化为特色,以文化交融为特征,以民俗心态为内核的对陕西、全国乃至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3]终南文化作为陕西颇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本文对其三大基本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一、文化形态上的山水之美

在文化形态上,终南文化以山水自然为依托,同时又以山水自然为表现内容,与山水的关系密不可分。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环境作为文化最基本的物质载体,是文化生发的原点,决定了文化的地理范围。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4]24}。

收稿日期: 2015-10-20

基金项目: 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基金项目(14XF20)

作者简介: 刘卓,女,河南巩县人,西安翻译学院人文艺术学院人文系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

二、文化追求上的自由超逸

终南文化在文化追求上的自由超逸境界,是主要根源于终南文化的宗教底蕴,同时又来自于古代文人的隐逸情怀。

终南作为秦岭最具特色的一段,山势雄伟、植被葱茏,优美的环境吸引着众多宗教徒、贵族、文人与隐士。对于宗教徒来说,澄澈自然的山水之美,使终南山有了一种宗教彼岸世界的神秘美感,遍布山间的道观寺庙也因此为终南文化贴上了自由超逸的标签。对于非宗教徒而言,疲惫而饱经忧患的心灵,可以在这里得到净化与安宁,得享精神上的超逸自由。二者虽然手段有异,但最终的文化追求都指向了:自由超逸。

终南山历来是宗教文化胜地,道观寺庙数不胜数。从先秦直至今日,各类宗教是构成终南文化底蕴的重要因素之一。宗教关注的总是彼岸世界,是天堂,是来生,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气质,终南文化超逸的精神追求也借由宗教信仰的层面表达出来。

终南山的楼观台是中国道教的祖庭与发祥地,相传老子曾在此地讲道,后来也在此地安葬。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比较早地系统提出宇宙本体论的哲学家,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无欲无为的。他认为道主静,“清静可为天下正”;道是柔弱的,“弱者也,道之用”。老子反对物欲,讲求精神生活;反对人为,讲求体法自然。所以他提出了“贵柔守雌”,“清静无为”的观点。他的思想为中国文化漆上了一层自然无为的底色。

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经典,以“道”为最高信仰,倡导天人合一的修持理念,追求清静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青山碧水历来都是道教中人从事宗教活动、隐居修行的绝佳之处。楼观台是道教的发祥地,有“天下第一福地”和“洞天之冠”的美誉。据《混元圣纪》和《终南仙境志》称,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建老子庙于尹喜草楼南侧,并躬行祭祀。汉武帝在楼观之北设立望仙宫,并增置道士。自此之后,楼观建筑逐渐形成规模,道教就在这依山傍水、绿荫蔽日的风景优美之地发端。道教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发展出无数派别,其中全真教的祖庭就位于终南山下的重阳宫。重阳宫为全真教开创者王重阳的旧居,他去世后,弟子将其遗骨葬于此地,建立重阳宫。全真教的出世思想颇为浓厚,在王重

阳等人的诗文中,指出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狱”、“火宅”,夫妻恩爱为“金枷玉锁”,劝人“跳出樊笼”,看破功名富贵,学道炼丹,以离“苦海”。这正是追求自由逍遥境界的具体体现。

此外,历代于终南山中所建道观可考或现存者尚有通道观、仙游观、丹阳观、长春观、四皓庙、玉真观、金仙观、开元观等数十座。这些道教宫观,都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程度,为道教的繁荣发展发挥过积极影响。此外,很多道士都曾隐居终南,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等。

终南山也是长安佛教的摇篮。东汉时期,终南山北麓户县境内建立了罗汉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大发展,终南山也成为众多僧人栖隐修行之所、佛教诸宗的策源地和教难时期佛教徒们的避难所。中国佛教的八个主要宗派中,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而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的发祥地即是终南山。户县草堂寺被认作三论宗祖庭,终南山天子峪的至相寺是华严宗的发祥地,终南山北麓沔峪口的净业寺是律宗起始地,终南山子午峪香积寺是净土宗祖庭。这里香火旺盛,僧人众多,所以有诗为证:“长安三千万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谛——苦、集、灭、道。佛教认为“人生皆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和五取蕴苦八苦。集谛指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佛教指出,“惑”与“业”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灭谛,指苦的消灭,是断灭各种人生烦恼之后所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佛教叫做“涅槃”。涅槃意为灭、灭度、寂灭、安乐、无为、解脱。这是一种安乐无为、解脱自在的境界。道谛,指超脱苦海、达到涅槃的方法。可以看到,佛教最终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烦恼苦痛,自由自在的超脱境界,这与终南文化的追求境界是一致的。

终南山不仅出现了道教宫观、佛教寺院,景教作为基督教的一支,也曾在这里留下痕迹。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唐代贞观九年(635年)聂斯脱里派传教团到达长安开始。后为唐朝所认可,并由唐朝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便是大秦寺。唐代有多处大秦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洛阳修养坊大秦寺,灵武大秦寺,五郡大秦寺,盩厔大秦寺,四川成都西门外大秦寺等,但最著名的,莫过于终南山北麓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大秦寺。今天这里仍然存留一座八角形楼阁式塔,这座大秦塔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座景教教堂的遗迹。正是在这里出土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景教流传下来的经典只有《序听迷诗所

《河》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和《尊经》等七部,其中《序听迷诗所(河)经》可能是现今所存的中国最古的景教经文。主要内容是,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上帝是至尊、至能、至善的,且是无形又无处不在的;人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人只有摄伏于上帝的“神威”,才能享受“长乐仙缘”;人如作“恶业”则“不得天道”,而“堕落恶道”;还涉及了反对偶像崇拜、摩西十诫、爱人如己、耶稣出生与受难等内容。对于人的“过客”身份的强调,是符合基督教提倡以天堂为故乡,而非以现世为归宿的追求的,这就显示出高逸精神所追求的境界。

终南山不仅是宗教圣地,亦为隐居胜地。除宗教教徒之外,许多古代文人也在此地隐居。这些隐士之所以栖身终南,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其精神境界与终南山的山风溪流、空谷密林相应和,唱出了一曲追求自由超逸精神的协奏曲。《后汉书·逸民传》中提到西汉末年著名隐士梁鸿,便携妻孟光隐居于霸陵山(终南山的一段)。新婚时梁鸿对妻子的期望是:“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超逸精神追求在此刻显明,梁鸿想要的是身着麻葛衣、能一同隐居到深山、同甘共苦的同路人。汉桓帝时期的隐士韩康,常在长安卖药,三十余年口不二价。当有人认出他时,他叹息说:“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因此遁入霸陵山中隐居。汉桓帝下诏征召,不得已入京,却于中途遁逃。或许清人朱鹤龄《俞无殊山居记》中的观点,能将他们的心理揭示一二:

“夫人处闾阖,喧卑之与俱,尘瑜之与交,必自厌其稠浊。一旦适苍奔,登高丘,览夫云峰之逶迤,泉流之淡冽,林木之翳蔚,无不忽然以喜,心旷神开者。及兴尽而返,稠浊如故。”^{[6]70}

身处城市,难免与喧嚣嘈杂为伍,能常享山林之乐,岂不乐乎?梁鸿与韩康正是因为不愿“稠浊”,才在终南山躬耕自足罢?这两位全无功名利禄之心、对官场避之不及的知识分子隐士,标识了终南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以《后汉书·逸民传》才赞道:

江海冥灭,山林长往。

远性风疏,逸情云上。

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时至今日,终南山中仍有隐士隐居。美国学者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就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寻隐之旅”。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并将自己的寻访经历写下来,《空谷幽兰》就此诞生。比尔·波特对中国自古以来的隐士传统非常推崇,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7]1}。终南

山可谓是隐士的天堂,张剑峰的《终南山:隐士之地》号称真实记录了终南山5000人隐居生活。隐士们的生活异常简单,“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7]3}2015年祥子的文章《没等你辞职看世界,我已归隐终南山》在网络上走红,讲的就是她自己——一个隐居终南的摄影师的故事。终南山下简单、质朴的生活,让她的身心充满了新鲜的活力,终南山已经成为她的心灵归宿,她的灵魂天堂。《旧唐书·隐逸传》说:

高士忘怀,不隐不显。

依隐钓名,真风渐鲜。

结庐泉石,投绂市朝。

心无出处,是曰逍遥。

终南文化便具有这样自由超逸的文化追求。

三、文化指向上的积极入世

仕与隐,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临最大的人生课题之一。以入世为目标指向,是终南文化的独特气质。从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看,终南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农耕为主,间有游耕,这导致终南文化具有固定性、循环性、务实性的特征。而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政治类型也使终南文化具有了强烈的入世倾向。两相叠加,终南文化从根本上便具有一种入世而务实的特征。从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来看,终南山位于长安以南,是长安城的后花园。“秦中自古帝王州”,长期与政治中心的靠近,使终南文化天然带上一层仕宦的色彩。这里是天子脚下,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是儒家思想,积极进取、出将入相是文人士子们追求的目标。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终南文化的目标指向,使具备山水之美,超逸之姿的终南文化,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指向:积极入世。

从“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到秦末隐居终南山的商山四皓,再到唐代的卢藏用,入世是终南隐士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当年在终南山磻溪垂钓的姜子牙,“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俛吟,及暮而释竿。”^{[8]《苻子·方外》}后与周文王相遇,相谈甚悦,“载与俱归,立为师”^{[9]《史记·齐太公世家》},最终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统治,平定天下。商山四皓则是秦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因刘邦慢侮士人,因此隐居,“义不为汉臣”。但最终却为太子刘盈所用,让刘邦息了换太子的念头。至今,在终南山下太乙宫镇上的四皓村,正是这四位隐士当年的栖身之地。

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隐居终南的人数不胜数,其中有相当比例都在出世入世之间徘徊,尤以唐代

为最。初唐时期田游岩,与母亲、妻子隐居太白山,后游历蜀、荆、楚地,在夷陵青溪居住。因被征召,“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出。”高宗亲自登门拜访,以商山四皓相较,拜崇文馆学士,后为太子洗马。归隐之后,“蚕衣耕食,不交当世,惟与韩法昭、宋之问为方外友云。”^[10]《新唐书·隐逸传》终南山是田游岩的隐居生涯的起始地,而他一生在隐居与仕宦之间的往来,也印证了终南文化的目标指向。“终南捷径”便是这种文化指向的最佳诠释。

“终南捷径”一词,出自《新唐书·隐逸传·卢藏用传》。卢藏用颇有才学,虽然中了进士,但却不得调遣,官场失意。于是和兄长一同隐居终南、少室二山,学习道士练气与辟谷之术,游历各大名山。虽然隐居山中,仍然“有意当世”,被称为“随驾隐士”。后在宦海沉浮数十载,将退隐之际,指着终南山与司马承祯言:“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回答:“在我看来,这是‘仕宦之捷径耳’。”^[10]《新唐书·隐逸传》身在山林,不忘功名,隐居以待时,借“捷径”以入仕,这便是终南捷径,也是终南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中国古代,尤其是唐朝,诸多文人士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旧唐书·隐逸传》中所载二十一人,除过卫大经、李元恺未入仕,余者皆曾为官作宰。其中固然有因官场不得志而归隐之人,但很多隐士因隐逸闻名而被朝廷征召,确是一个事实。李白、孟浩然等人均在终南山隐居,期待以隐士之身闻名天下,再跻身朝堂,也是终南文化带给他们的独特选择。这些终南隐士们并不是仅仅想要依靠隐居邀名而被帝王征辟,而是心怀天下、有济世报国之志的有志之士。他们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做出贡献。宋代大儒张载虽然曾经隐居终南山,说“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仰荫高林茂,俯临绿水流”,但毕竟其思想也是以积极入世为指向的。《新唐书·隐逸传》说:“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10]《新唐书·隐逸传》,话虽偏激,但以终南文化入世为目的的是与关中长久以来的文化背景相契合的。

之所以会形成“终南捷径”,形成这种积极入世的独特文化指向,与终南文化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与长安相距不远,历朝历代诸多达官显贵均在终南山置业,营造别墅园林。汉代皇家的上林苑便涵盖了终南山。终南山也常常是贵族文人园林别业的选址之地,唐代诗人岑参就在终南山高冠瀑布处置有庄园,玉真公主的别馆延生观也坐落在终南山。当然,最出名的是王维,他在宋之问庄园基础上修建了辋川别业,就在终南山北麓蓝田辋川,风景如画,犹如世外桃源。

距终南山不过二十里的樊川,更是别墅林立。

自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达官贵人营构园林之处,韦、杜两姓贵族世代居住于此。宋之问《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云:

“长安城南有韦曲庄,京郊之表胜也。却倚城阙,朱雀起而为门;斜枕冈峦,黑龙卧而周宅。贤臣作相,旧号儒宗,圣后配元,今为戚里。……万株果树,色杂云霞;千亩竹林,气含烟雾。激樊川而萦碧瀨,浸以成陂;望太乙而邻少微,森然逼座。”^[11]²⁷²²

韦曲、杜曲二曲名胜之地多建贵族园苑、王侯别墅,“轩冕相望,园池栉比”,唐朝岐国公杜佑的别墅就在这里,其“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因达官贵人常来终南山游乐,在终南隐居不正是能闻名于诸侯么?唐代“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正是终南捷径的一种具体化的表现么?清代顾沅《凤池园记》所说“窃尝谓,士君子处庙堂之上,当时存泉石之思;处江湖之远,亦当无忘宗社之虑”^[12]²⁵¹,就颇能概括终南文化的气质。明代唐顺之《送彭通判致仕序》中也有“去就有二途,而仕隐无二道”的说法,以归隐之心为官,以为官之心归隐,实在与终南文化有相通之处。

故此可见,终南文化对仕宦体制与世俗价值体系的认同,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终南文化的三大基本特征是:文化形态上的山水之美、文化追求上的超逸之姿、文化指向上的仕宦之心。

[参考文献]

- [1] 毛凤枝. 南山谷口考校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2] 刘庆柱. 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3] 史飞翔,陶蹦蹦. 终南文化初探[J]. 教育教学论坛, 2014, 4(14).
- [4]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5] 唐卫萍. 身份建构的焦虑:北宋士人画观念的发展演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6] 黄卓越. 闲雅小品集观·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下[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 [7] 比尔·波特. 空谷幽兰[M]. 明洁,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8]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宋祁,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 周绍良. 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1册[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12] 鲁晨海.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书选:第5辑[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朱毅然]